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五二期 ——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6c)

【本刊专稿】	叶剑英——批判罗瑞卿的急先锋	袁笠翁
【当事者言】	杨尚昆谈所谓“秘密录音”	苏维民
【文革一页】	难忘关怀：我所感受到的周总理	杨银禄
【人物春秋】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节选二）	舒云
【回首文革】	“文革”中，我在西德当大使	王殊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叶剑英——批判罗瑞卿的急先锋

• 袁笠翁 •

叶剑英是“倒罗”的主角。二人在建国伊始就结怨，在庐山会议后，叶罗在工作上的冲突则愈演愈烈。当毛泽东决定要拿掉罗瑞卿，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铲平道路时，叶剑英自然而然成了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干将。

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05.16；中发〔66〕268号）中六次提到叶剑英的名字。此通知所提到的主要有关叶的内容包含：（1）叶剑英在三月份至四月份中央召开的批判罗瑞卿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一并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2）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上是在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3）罗瑞卿对叶剑英进行过攻击和诽谤；（4）由叶剑英亲自抓的“郭兴福教学法”，事后罗瑞卿发现此举“大有油水”，便撇开叶剑英，把功劳据为己有。

叶剑英和罗瑞卿之间会产生矛盾，不仅仅是因为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更重要的是罗瑞卿自己倚仗是毛泽东所“信任”的人，在处理事情上根本不留转圜的余地，早在广东“二陈事件”开始，二人便已经埋下冲突的种子。罗瑞卿一手主导的“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的主角陈泊、陈坤（二陈事件）都是叶剑英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叶剑英曾经对此严厉质问罗瑞卿，陈泊何罪之有？叶对此甚为不满。罗瑞卿丝毫不买叶的帐，反唇相讥，当面驳斥，根本不把叶放在眼里。

历史的真实还在于，此事不久之后叶剑英就被卷入“反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政治风波之中，其实“两陈案”就是广东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征兆。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叶剑英在会上检讨道：“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自然“二陈”也是被累及其中。（1）可以推测，如果不是毛泽东此时无意打倒叶剑英，罗瑞卿极有可能把叶烩在“两陈案”里面。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军委改组。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21人组成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13人；军委委员有：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粟裕、陈赓、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秘书长为罗瑞卿，苏振华、萧向荣为副秘书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但是中央军委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59年10月20日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办公会议的机构，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其成员为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1962年毛泽东又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过：“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2）这样一个人事格局造成了事实上的大将领导元帅——罗瑞卿领导叶剑英。大将排名第三的黄克诚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召集联席会议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在彭德怀、聂荣臻及其他军委委员不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时任总参谋长、排名第一的粟裕大将向黄汇报工作就磕磕碰碰，何况大将领导元帅呢？

而且正如毛泽东评价：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罗不尊重各位元帅。（3）不尊重不仅表现在对这些老师们的评论上，而且表现在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支持。吴法宪曾听叶剑英说过，罗瑞卿对他不够尊重。叶剑英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除了老师，军内外也不断有其他人到林彪这里告状。（4）王秉璋也回忆到这个事情。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叶剑英为了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但是罗瑞卿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叶剑英自然对此非常恼火，连同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就此同个时间，毛泽东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5）此事由邱会作的回忆得到证实。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大约1965年5、6月间，中央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在休息室聊天。我怕打扰他们，想退出，他们招手让我坐下。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

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没点名，但我听明白了，罗瑞卿一向被称作“罗长子”嘛。叶帅对我说：我们谈话，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6）按叶剑英的说法，罗瑞卿是“罗长子”。而军中老人则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瑞卿的个子高（1米82）；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7）叶剑英因为“二陈事件”和罗瑞卿结怨，指的必定是后者。

1965年的11月29日，毛办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毛泽东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8）

由于林彪在1963年5、6月曾经两次让秘书和叶群打电话给总参谋长罗瑞卿，说身体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第一线的同志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自己负责，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直接报告主席、中央。而如今罗瑞卿却对一些老帅们不尊重，以致告状不断，林彪觉得也难辞其咎。邱会作回忆：1965年8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林彪有些不好意思。平时不管谁来看望林彪，林彪很少先说话，这次他主动说，他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叶帅笑了，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9）

1965年11月，叶剑英突然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10）叶剑英没想到墙后有耳，叶群和林豆豆在屏风后面全听到了。毛泽东认为罗瑞卿是刘少奇的人，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了。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11）

从上述可以看出叶剑英对于“倒罗”在毛泽东授意下是积极参与的。据徐厚田回忆：1980年审理“两案”，意外发现雷英夫交出五个记录他在高层活动的笔记本。后来说雷英夫有问题，主要是他揭发罗瑞卿。雷英夫坐在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大哭，说我的问题只有叶帅能说清楚，而叶帅当时已经病得不能说话了。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经过调查，认为雷英夫是理解毛主席的意图才揭发罗瑞卿的，他的揭发并不是什么要害问题，也没有诬陷。（12）雷英夫的话表明，叶剑英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而且雷英夫的活动也是其支持或者至少是知情的。

开上海会议之前，谢富治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是不是忘记通知他了？叶剑英看谢富治问个没完，就说，主席不会忘事。张耀祠后来说，看来叶剑英已经知道一点来头。叶剑英确实知道。叶剑英不仅是个知情者，而且是参与“编网”者。罗瑞卿的一位部下这样回忆，1965年11月4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叶帅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说完，叶帅没有评论。我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叶帅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几天后，我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我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

也被打过招呼。果然，上海会议之前，李作鹏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上海会议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为此，罗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13）

叶剑英实际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罗瑞卿的梢！而后来叶群说提出的“叶四点”完全是叶剑英提出的这四点的翻版！因为叶群所说罗瑞卿通过刘亚楼讲的四点如下：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2：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叶四点”其中心内容是罗瑞卿要主管军队，做国防部长，叶剑英对这位罗瑞卿的部下所讲远比“叶四点”厉害，基本上就是后来给罗瑞卿定罪的基础——由折磨封锁林彪发展到反对林彪。但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点？很明显，毛泽东决定要打倒罗瑞卿之时，不再象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赤膊上阵，那样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毛泽东要借用林罗的矛盾，这样通过叶群的口说出无疑要比通过叶剑英的口砝码重的多！另外比这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倒罗”的战车上，而对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后来根本就没有形成以叶群讲话为主要内容的下发中央文件！

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尽管范硕百般为叶剑英解脱，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事实果真如此吗？就在1965年12月15日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因为刚揪出了罗瑞卿，干部当时还是非常紧张，但是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助兴。作为广州人的叶剑英结果却唱出了道地的苏州评弹，周恩来同叶剑英的配合真是相得益彰。（14）罗瑞卿回忆到，“（在三月会议上）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听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15）单世联则认为罗点点所言“诗意大发”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16）

所谓的“诗意大发”指的是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而原来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为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的文采风流之至，这“一跳”是改的入木三分，夺人心魄，“身名裂”则是形容万分贴切，叶剑英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心态跃然纸上。诚如丁抒所言，杨成武所说叶改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是全然不顾事实了。（17）

在三月会议之后，由叶剑英主持写了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并被下发到县团级。至于叶剑英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批罗”，叶剑英如是说：我们同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的斗争，我们同罗瑞卿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罗瑞卿这一小撮篡军反党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在某些方面还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18）

但是上海会议只是决定把罗瑞卿清理出军队系统。三月批罗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给毛，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毛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

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但是叶剑英并没有把此批示告之罗，而是把罗朝死里整。罗此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毛身上。罗在3月18日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随即跳楼自杀。周恩来得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罗是自绝于党。（19）

注释：

- （1）晓农《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文史精华》2005年第5期
- （2）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3）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毛泽东《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谈话》1965年12月2日
- （4）舒云《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
- （5）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华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页。
- （6）舒云《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
- （7）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增刊第三一四期（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五一）（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 （8）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 （9）舒云《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
- （10）王年一 《王年一手稿： 文革漫谈》
- （11）舒云《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
- （12）舒云《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
- （13）舒云《大将罗瑞卿和1965年上海会议》
- （14）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 被人放入箩筐游斗”； 佟言 《党史博采》（纪实版） 《陈泊：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的情报奇才》 2006年第10期 （周恩来在建国之初过问两陈的案件但是罗瑞卿根本不理周恩来，而且还出言不逊）
- （15）点点 《点点记忆》（下），《当代》（北京），1998年第5期，页39
- （16）单世联 《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 （17）丁抒 《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 （18）《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2 / 31 / 1966》引自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19）张聂尔的采访。本人是通过同张的对话以及张对其好友的谈话而知。毛泽东的批示在哈佛有原稿，载于文革期间编纂的《批罗战报》。本人看过此批示同张所讲吻合。）

~~~~~

## 【当事者言】

### 杨尚昆谈所谓“秘密录音”

• 苏维民 •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上个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 ◇ “秘密录音”问题真相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

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局、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 ◇ 杨尚昆严肃对待毛泽东的批评

在座的中办老同志，围绕“秘密录音”问题，也纷纷发言。

他们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要进行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1958年7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外出巡视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

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康、赖二人和毛泽东见面，对康、赖说，毛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8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录音。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事先没有报告经他同意的录音，并非批评一般的“秘密录音”。

#### ◇ 艰难的平反之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录音问题被江青一伙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录音”问题并升级为“秘密窃听”。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很清楚，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杨尚昆的诬陷。录音，是机要室业务范围的一项正常工作，所有录音带事后都要整理成文字材料，形成一个正式文种名为《记录稿》。

《记录稿》编号存档备查，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调阅过《记录稿》，这是有登记可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本来就是掌管党的全部机密的岗位，按照规定杨尚昆要阅看党的全部机密文件，以了解全面情况。所谓窃听、窃密，纯属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设备，当然一无所获，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还将机要室进行录音工作所使用的录音机、受话器、电线等拍成照片，作为“秘密录音”的“罪证”装进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三人的档案。但他们却隐瞒了1961年毛泽东严厉批评录音工作时，汪东兴等五人和录音机的四张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诬陷，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



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但是他们经过十多年的所谓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盗窃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事实根据，而许多好同志却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但是，1978年11月25日，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对“秘密录音”问题，有必要再认真地复查一次，以彻底澄清事实真相。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澄清了事实，调查结果认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1980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杨尚昆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因“私录毛主席谈话”，最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 《百年潮》 2008年第4期

~~~~~  
【文革一页】

难忘关怀：我所感受到的周总理

• 杨银禄 •

在我担任江青的秘书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接触总理的机会比较多，同时受到总理的直接关心、照顾和帮助也比较多。其中有几件事使我深受感动，永远不会忘记。

◇ 对老同志能保护的一定要保护

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总理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一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给总理送一份文件，他接过文件以后，亲切地对我说：“银禄同志，请坐下，我现在有点时间，想和你聊聊。”

由于总理平易近人，说话和蔼可亲，所以，我一点也不拘束。一张大长条桌，他坐在桌子的南边，我坐在桌子的西边。我和总理挨得非常近。总理问我多大岁数，老家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几个劳动力，粮食够不够吃，个人有什么困难。

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在这里工作难度较大，有好多事不好办。”

总理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问的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是说通过你的努力，也无能为力解决的问题，例如你和你的家庭遇到特大困难无法克服啦，由于某种因素你的亲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啦等等。”

我不想麻烦总理，但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还是说出一个情况。我说：“我的二姐夫叫李汉章，1942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造反派硬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将他不明不白地抓走了，已经三个多月了，到现在毫无音信。我姐姐整天哭泣，她现在是望眼欲穿，急切盼望他早日回家团聚。”

总理非常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后，关切地问道：“你姐夫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单位的造反派将他抓走的？”

我说：“他在河北省定县城关区任副区长，是被城关区的造反派抓走的。”

总理在信笺上认真记下了我姐夫的名字、工作单位，并说：“此事我请东兴同志通过中办了解一下，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能够保护的，一定要保护。”

第三天，姐姐给我打来电报，说：“你姐夫被安全送回家，勿念。”

有一天，总理到钓鱼台11号楼与江青谈工作，总理一进楼看到我就问：“银禄同志，你姐夫被放回家了吗？”我非常感动地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姐夫已经安全地回家了。”总理说：“那好嘛，不用谢，我说过，对老干部能保护的，就保护。你们定县的革命群众还不错嘛，还是听话的嘛。”

过了一周，姐夫给我来信，其中有一段写道：“造反派抓我的时候，气势汹汹，又推又搽，放我的时候客客气气，还给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们冤枉你了，请你原谅，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他们的态度反差这样大，转变这样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真把人搞糊涂了。”

我接到信以后，由于保密的原因，回信时我没有告诉姐夫是周总理保护了他。直到1994年，姐夫患了不治之症，临终前，我才将这一秘密告诉了他。年过七旬的他，听了以后，激动得老泪纵横。我也触景生情，流下了眼泪。

◇ 组织专家为我治病

1969年冬季的一天，我突然患病，发热、腹痛，又吐又泻，全身无力。正巧，这天江青也感觉身体不适，请吴阶平大夫来看病。

吴大夫给江青看完病，发现我气色不好，躺在前厅的长沙发上，便询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是。

吴大夫是我国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人品极好。江青对吴大夫的医术也很佩服，她听吴大夫说我病了，愣愣地望着我，像是在说，怎么生了病也不说一声。

趁吴大夫得暇，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吴大夫。经过询问、触摸，吴大夫确诊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可能已经化脓了。

吴大夫向江青报告说：“杨秘书患了阑尾炎，估计化脓了，再不手术治疗，就有穿孔的危险，请示你尽快送他到医院治疗。”

江青听了以后，先是一惊，很不高兴地说：“那好吧，快去快回，我这里的工作离不开他。”

动手术那一天，周总理派去了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卞医生遵照总理的嘱托，不仅请去了吴阶平，还请去了著名的外科专家吴蔚然和心脏科专家黄宛到305医院会诊。最后决定由吴蔚然大夫主刀，其他三位专家配合。

做完手术，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心情很不平静。

手术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和邓大姐委派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到医院看望我。

王良恩对我说：“总理和邓大姐对你很惦记，他们知道你心脏不好，怕你休息不好，特意嘱咐我尽量在医院给你安排一个单间住。305医院刚成立不久，房子紧张，你住的这间房子是一位副院长的办公室腾出来的。”

听了王良恩的话以后，我又一次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王良恩接着说：“你的手术很成功，总理和邓大姐知道以后很高兴，今天特派我来看望你，叫你不要着急，既来之则安之，安心养病。总理说，你们那里的工作很繁忙、很辛苦，精神高度紧张，现在你在医院里静养几天，也是个精神调节、缓解的过程。”

王良恩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一袋香蕉和一袋红苹果对我说：“这是总理和邓大姐给你买的。邓大姐还叫我告诉你，手术以后，能下床活动的话，尽量早一点下床活动活动，先小活动，以后逐渐加大活动量，别光躺在床上不动，防止肠粘连。”

我激动得哽咽着对王良恩说：“请你报告总理和邓大姐，我非常感谢总理和邓大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一定按首长的嘱咐，安心养病，病好了，早日回去工作。”

又过了两天，总理和邓大姐对我还是放心不下，又委派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杨德中到医院看望我。

杨德中说：“总理说，你们在那里工作很辛苦，也受了不少委屈，在你们有困难的时候，组织上要多一些同情、安慰和关心，对每一位干部和职工既要使用，又要关心，关心是为了使用，使用必须关心，这是负责同志的职责，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 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凡是在江青那里工作过的，都知道江青有几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其中一个就是打铃声。

江青给我们规定，她打一声是叫秘书，打两声是叫护士，打三声是叫警卫员。打铃叫谁，谁就必须马上到，半分钟也不准耽搁，也就是说铃声停，人即到。她不能等人，稍微一等就发脾气，轻则满面怒容，训斥、谩骂，重则扣大帽子。

有一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三层一个小会议室开会。由于会议内容保密，工作人员便都在一层等候。一层没有电铃，江青有事找我就叫大会堂的服务员打电话让我上去。

我接到电话，想坐电梯上去，可是电梯停在三层，等着中央领导散会时乘电梯下来。我只好从一层往三层爬。人民大会堂的楼层特别高，从一层到三层有104个台阶，我快速爬到三层以后，已是气喘吁吁，嘴唇青紫、脸色苍白。

我开门进入会议室时，总理正在发言，总理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停止了讲话，从沙发上站起来，很严肃地问我：“英路同志（江青给我改的名字），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江青说：“是我叫他上来的。”

总理说：“我是问他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总理仔细看着我，更加严肃地对我说：“你不晓得你的心脏不好吗？我的医生告诉过我，你得了器质性心脏病，你要学会保护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难道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江青说：“我是个急性子，你是晓得的，我叫他们的时候，都得快速到我的身边，他们怕我着急，这是他们养成的习惯。”

总理听了江青的解释，坐回沙发上，对江青说：“英路同志的心脏不好，不能使他过分紧张，否则会出问题的。”

江青说：“小杨有心脏病，我怎么不知道？唉，即使心脏有点小毛病，也没必要大惊小怪的，活动活动也许会好些，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

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叫服务员把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找来，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对医生说：“把我常用的治心脏病的药给英路同志一瓶，咱们今天定下来，从今天起，你每个月给他一瓶。”

医生点点头说：“好。”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我手中的那瓶药上。

◇ 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1年底的一天下午，服务员小李发现钓鱼台17号楼大客厅的西门门轴在关门的时候老爱吱吱作响，出于好意，主动到机关借了一个小油壶往门轴上膏几滴油，想润滑一下。小李膏油的时候，用手指按动油壶底部，按一下就发出一声“叭哒”的声音，按动得越快，“叭哒”的声音频律也就越快。

小李刚刚膏了几滴油，江青就从客厅的东门进去看文件了。由于西门里面被一个大屏风挡着，小李看不到江青已进入大客厅，继续膏油。

江青听到“叭哒”“叭哒”的声音，立即惊慌起来，怀疑有人往枪里安装子弹企图打死她。

江青打了一声长铃叫我，我进入大客厅以后，看到她两眼发直，面色苍白，精神十分紧张。

江青用颤抖的声音小声对我说：“小杨，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安装子弹的声音？”她还没有等我回答，就肯定地说：“对，没有错，是安装子弹的声音，有人企图打死我，今天要出大事了，现在刺客就在这个大厅的西边不远的地方，你赶快循着响声，脚步轻轻地、速度快地过去看看，不要被敌人发现你，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当场抓获这个刺客。”

“组织上把我的生命安全交给你们，你们可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负责呀！”江青继续颤抖着

说。

江青说完，我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声音，并不像是安装子弹的声音。我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兵，安装子弹根本不是那种声音，也不相信来了什么刺客，钓鱼台的各个大门被警卫部队把守得严严实实的。

但我不敢违背江青的意思，还是顺着声音，来到了大厅的西门外。过去一看，小李正蹲着往门轴上膏油呢，他膏得还很认真，我走过去，他都没有发现。

我弯下身子，小声对小李说：“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膏油呢？江青已经到大客厅办公了，你还不知道吧？你可惹下大祸了，她听到你按油壶的声音，怀疑是刺客在上子弹，企图打死她，你快别膏了。”

小李听我这么一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立刻离开那里，快步到大厅西边的小礼堂去了。

我回到大客厅，把我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江青，并解释说：“小李不知道你现在在这里办公。他也是好意，知道你怕声音，在门轴上膏点油，开门、关门时就不吱吱作响了，但是，他在这时膏油的确不是时候，使你受惊吓了，这是我的责任，没有把这件事安排好，你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江青听完我的汇报和解释后，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大骂道：“你混蛋！我今天要骂人了，你对我说的我根本不相信，我现在怀疑你和那个刺客是一伙的，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我命令你立即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来处理这件大谋杀案。快去，快去！”

我矛盾极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大概过了几分钟，我看江青有些累了，火气似乎也小了，便壮着胆子向江青又说了一句：“你对我的解释如果不相信的话，我把小李叫来，请你亲自问问他，好吗？”

这时，江青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抓起几块毛巾狠狠地摔到我的脸上，大声吼道：“你胆大包天，竟敢顶撞我，你可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你骗不了我，如果你再解释的话，就真的犯了欺君之罪！过去对犯了欺君之罪的是要杀头的，你懂吗？！快去给总理打电话，你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江青说完又一屁股坐下。

江青给我上纲上得够高的了，如果我再说半句话，她会毫不犹豫地叫人把我关进监狱。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忙说：“请你不要着急，我去打电话。”

说完，我立即走出大客厅。

我走出大客厅，来到楼门厅，很不情愿地叫通了总理的电话。

总理没有问江青找他去有什么事，只说一句：“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些事没有办完，等我办完了就去，请你报告江青同志，请她不要着急。”

我放下电话走进大客厅，把我和总理通话的情况报告了江青。

江青一听总理说等一下才能来，表现出很不耐烦、很不高兴的样子。

江青瘫坐在沙发上，眯缝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也不着急，还不叫我着急，不赶快来查办。”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打铃叫我进去，我知道江青等着急了。

果然，我一进门，江青便不耐烦地对我说：“你再给总理打电话，请他快点来，我等不及了。”

我说：“好。”我扭头走出大客厅。

我想，总理工作那么忙，我不能再打电话催他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总理来到17号楼。我连忙迎上前去，把一个小时前这里发生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了以后，慈祥地对我们说：“你们都别紧张，这件事我去向江青同志解释。”

总理走进大客厅以后，我就听到江青大喊大叫。大客厅的门是密封门，我虽然听不清楚江青喊叫的是什麼，但是，可以猜得出她对总理的解释很不满意，坚持自己的怀疑是对的。

这时，我听到总理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完全压住了江青的喊叫，继而也听不到江青的声音了。我想一定是总理把江青说服了，我们极度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90分钟以后，总理从大客厅出来，主动走到我们跟前，和我们在场的五位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勉励我们：“你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了解你们，毛主席了解你们，你们都是组织上派来的，你们都是好同志，这天的事，是小李出于好意，但是，今后要注意，好的动机要有好的结果。有时候好的动机，不能被人理解，是常有的。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要沉住气。你们看着主席、看着我的面子也要好好工作，工作再细致些就更好了。”

几天后，总理给我打来电话，他关切地对我说：“我要到外地去了，我现在是在飞机场给你打电话。那天的事，我建议你们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工作要细心，小心谨慎，你是那里的头儿，不对，你是那里的负责人，要把大家组织领导好，工作不要出纰漏。我出去这几天，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请示报告东兴同志。”

我向总理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努力地把工作做好。”

总理说：“那就好，我相信你们会做好工作的。”

我放下电话，立即把总理的指示转告给大家，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做好工作为总理争气，避免因江青的生活琐事而打扰总理。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3期

~~~~~

【人物春秋】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节选二）

• 舒 云 •

## ◇ 北京的杨勇怎么回事

1967年秋，树叶早早落了，林彬被强迫搬到另一条街的大杂院里，那是一个大四合院的最后一排平房，给他们一人配了一个单人床，加上家中的几个破箱子，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天杜心从八大处下来，打听杨勇家搬到什么地方，一位管理局长咬着耳朵偷偷告诉他杨勇家的地址。杜心和爱人顾丽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但他扒着门看见里面有一台熟悉的苏式黑白电视机，认定没找错。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进屋里，问他干什么。杜心说，家属不应该有罪，听说他孩子流落街头，我想把杨勇的孩子接到家中，我养。老人好心地，他们已经到宁夏干校去了，你们再不要来了，这个院有人监视，会汇报上去的。

旧房子久没人住，窗纸全破了。也没有窗帘，侄女沙瑞平自报奋勇回去拿。原来的房子有一个老头看着，老头还善良，帮她摘下两个窗帘。

就在这破旧的小屋里，林彬和孩子们中了煤气。那时快到冬天，生了蜂窝煤火，以前没生过，不会用。孩子们睡了，林彬那时老写上诉材料，睡得晚。所以林彬中的煤气不是很严重，瑞平起来到前院上厕所，让风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倒在家里，林彬慌慌张张赶快开窗户。

好在不算厉害。

到第二个冬天来临时，机关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宁夏干校，这时杨勇还是没有消息。大儿子杨小平从东北赶回北京，林彬写了一封信，让杨小平去找杨勇过去的老部下，求他帮忙让北北当个小兵。

那时，杨冀平自己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一腔热血，到了那里人家却不收，说离边境太近，成分不好，不符合条件，杨冀平只好扒火车返回北京。总不能呆在家里，他又在学校报名去山西插队。户口都转了，母亲林彬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去宁夏。反正到哪都一样，杨冀平决定就去宁夏。

这样林彬主要担心老三北北，如果把北北安排了，老二冀平和女儿京京她可以带到宁夏。北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让他去宁夏农场干活，他还干不动。半大孩子留在乱糟糟的京城，更不放心。

杨小平和父亲杨勇一样，从不愿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看到母亲那么为难，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见，家属冷冰冰地出来，问有什么事。杨小平递上信，就走了。其实那位老部下大权在握，办个小兵入伍轻而易举，连拍手之劳都算不上。可是在那种时候，躲还躲不及呢。

林彬没办法，她不可能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宁夏。只好狠心把京京也留在北京，给北北做个伴，只带冀平一个人走。

以后，杨小平到石家庄时把这些都告诉了还在被关押的杨勇。

杨勇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也连累了林彬。之后，转过身去，仰望着窗外，久久不语。杨小平知道，父亲在尽量抑制自己，怕在孩子们面前掉下眼泪，引起更多的伤心。

林彬临走前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

林彬希望杨勇的问题如果有结论，请组织上通知她单位。

专案组的人说，杨勇的结论就是“三反分子”，还指望什么结论，你要继续揭发杨勇的问题。这时，他们发现一把生锈的半截刺刀，追问是从哪里搞来的凶器，并报告警察抓走了杨冀平。

凌晨4点多了，眼看要误车，林彬才从派出所带回冀平，一起上了火车。

家里留下三个小孩子，瑞平、北北和京京。三个孩子中，瑞平最大，那年也才十四五岁。他们自己起火做饭，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北北是“账房先生”，管全家的账。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多，必须精打细算，不能多花一分钱。瑞平的爸爸有时过来看看，给他们带一点酱好的肉，孩子们三两下就吃进肚子里去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笔钱，买了一只活鸡。活鸡买回来傻眼了，谁也不会杀。三个孩子中的男子汉北北自告奋勇，当屠宰师。他蹑手蹑脚上前抓住鸡头，顺脖子抹了一刀。鸡血流出来，鸡躺地上不动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了半天，北北说，好像应该烧开水。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烧开水吧。北北把开水往死鸡身上一浇，好，死鸡活了，猛地往起一蹿，歪着掉了半拉的鸡头，满院子疯跑开了。

几个孩子满院子“围追堵截”。

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别人家都有长钩子，可以把水井里的闸门钩开，他们没有，只有跳到井里才能拧开水闸。

这一段，三个孩子读了不少书。二哥冀平从图书馆弄回好多世界名著，北北给藏到顶棚上，孩子们坐在屋顶上，一读就是一天。

孩子毕竟是孩子，遭了那么大难，但玩心仍不退。正熬着一大锅白菜，北北在房上喊，后街武斗喽。京京和瑞平争先恐后往墙头上爬。等回来一看，一锅白菜全糊成锅巴了。

到年底，林彬回来了，又黑又瘦，头发全白了，那一年她才48岁。她一进门，看见瑞平歪歪斜斜拎着一大桶水走过来，当时就哭了。

过去她在商业部的同事小周出差时特意绕路告诉她，毛主席在“九大”讲了话，……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死揪着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谅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

可“九大”过去半年多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这时，杨小平从东北回来结婚。林彬和他商量，决定由他出面，提出要求看望爸爸。

专案组的人说无权答复。

林彬一夜没睡，想了很久，只有求周总理这最后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她赶写了一封信，



请李先念转给周总理。过了一天，李先念的秘书来告诉林彬，信已转给总理，总理一直很关心杨勇，估计很快会让你们见面。

林彬在焦急中盼了四天四夜，院子有点动静，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数九寒天，林彬病倒了，烧得嗓子讲不出话来。第四天下午，专案组终于来人，说你们去吧，杨勇在石家庄。

为什么在石家庄？

专案组不说。

杨小平追问是不是总理有批示，专案组避而不答，只是让林彬快去看杨勇，说你要不去，我们没法交代。

林彬明白了，是总理过问了此事。

因为要去石家庄，林彬没坚持要去，孩子们劝她，她也想自己病得这个样子，可能会给杨勇增加精神负担，商量结果由杨小平带北北去，京京陪妈妈在家。

杨勇爱吃凤尾鱼罐头，买不到，后来林彬的同事从远郊买到了，但却不许给杨勇送东西了，只好把几盒罐头放进箱子里。

这次，林彬想起这几盒罐头，让杨小平带给爸爸。

◇ 我相信迟早会搞清楚的

到了石家庄，杨小平和北北被专案组领到一个招待所里。到现在，北北也不知道是在石家庄的什么地方，只记得是个好大的院子，里面有几座楼。奇怪的是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更显得院子大得不得了。

这时杨勇还没到。等了两个多小时，天都黑了，杨勇来了，后面跟着专案组的人。杨小平第一个印象，是父亲很瘦，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此时的杨勇，体重已经从文革前的80多公斤下降到仅50公斤。他穿着一身破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军棉袄，扣紧风纪扣，整整齐齐。但能看出是他自己缝的针线，那么大的针脚。

杨勇神态自若，步履坚定，一边上楼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像战争年代察看地形一样，成了职业习惯。

他见两个儿子，猛一愣，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

可以看出他极力克制着激动，眉峰抖颤不止。

杨勇问，你们怎么来了？

两个儿子也同样激动，跑上去一人一只握住爸爸那双瘦而布满老茧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专案组的人也跟了进来，杨勇说，这是我们家里人说话，你们离远点。

专案组的人无奈，只好打开了房门，坐在门口。

两个儿子和爸爸含着泪相视笑了。

当杨小平说到这次见面是在总理和先念同志的帮助和亲自过问下才争取到的，杨勇眼角潮湿了，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

杨小平开始讲这三年以来的种种情况，从二月逆流、王关戚、杨余傅一直讲到“九大”毛主席的话。杨勇用手势示意他隔墙有耳，让北北在门口听动静。

杨小平告诉父亲，中央开了华北会议，整你的人都下台了，你还不把他们的罪行整理几条报告中央。

杨勇说，那种投机的事决不能干！这几年我被关起来，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我不能凭空捏造，他们的问题由中央处理去。

杨小平说，5月14日，总理向党政口传达了毛主席在会上的几次重要讲话，其中就有关于您的内容。

杨勇气愤地说，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杨勇细问了“九大”召开的时间和有关会议的情况，久久没有说话。

他脸上的表情极复杂。

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专案组从4月开始，白天让他去田里劳动，晚上整夜搞疲劳轰炸，似乎一定要搞出点什么材料来。有一次，连着几天不让睡觉，杨勇说，好，我按你们说的交代，拿笔来。

话刚说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了整整一天。

那时杨勇被关在西山一座小楼里，夏天山里蚊虫多，还要按上边的意思点亮一个200瓦的大灯泡，引得蚊虫乱舞，却不许挂蚊帐。杨勇写条子从家里要了一个大布单。家里还奇怪他要这个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用大布单蒙住头睡觉。

杨勇被关到楼上，窗户大开着。不知什么意思，桌上放着一瓶安眠药。以后，又有意无意在床头放过一根背包带。刚开始杨勇没理解，放了好几次，杨勇对专案组表示，我不会死，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他挥笔在纸上写了曹植的一首五言诗：煮豆燃豆其，其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专案组来催材料，杨勇说，有些问题很复杂，关系到党内重大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年轻，对有些问题的复杂性不了解，不要跟着人云亦云。我的问题，党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这样的态度当然得罪了专案组，有一次罚杨勇站了16个小时，脚肿得连鞋也穿不上。半夜他们吃夜餐去了，杨勇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也跟着去吃。

杨勇没有对孩子们说这些，他坚定地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义！

杨小平说到母亲准备带北北和京京去宁夏干校。

杨勇对北北说，几年不见，你还是本本主义，运动一来，娘老子都靠不住了，只好自己动手，这样摔打摔打，你们就知道日子的艰难。过去我最担心你们养尊处优，现在我倒放心了。干部子女，从小顺顺当当，受点挫折，吃点苦，多接触接触群众好。冀平跟妈妈去宁夏我赞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对。走留由你们自己拿主意。总之，无论在哪儿都要踏踏实实地干，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

杨小平是哈军工的高材生，杨勇劝他，你学的是导弹专业，现在让你去当锻工，这是很不合理，可话又说回来，这对你个人也不是没有好处。过去，我就有个想法，让你大学毕业后到工农中去锻炼几年，不懂得工农，怎么为工农服务？莫得牢骚，这种状况长不了，我相信国家迟早会考虑如何发挥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专长。你要打起精神来，现在最难过的是没有工作做啊……

父子相对无言。

杨勇忽然翻开棉衣，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叠钱交给杨小平，说这是我三年来攒下的100元钱，就算祝贺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杨勇每月25元的生活费，除去吃饭，还要抽烟。为了省下这点钱，杨勇常常捡树叶子当烟抽。杨小平说，钱爸爸留着用吧，知道爸爸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

谈话顶多进行了半小时，杨勇站起来，想了想，说回去告诉林彬，我相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说，我不会死，除非……

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了。

◇ 周总理决定立即派专机

宁夏的日子在沉重的劳动中一天一天过去。

这中间，杨勇来过一封信，六七页的信纸已经被墨线分割，好在还有断字残句。

林彬和孩子们商量给爸爸写回信，大家一致认为要捡高兴的话说。青海骑兵看上了身材高大的杨冀平，不管爸爸怎么样，都要把他接走。在几个儿子中，杨冀平长得最像杨勇，性格也像。他很小就想当兵，杨勇也很希望他能当兵。冀平上了初中，每个寒暑假杨勇都要把他送到部队与战士一起吃住，一起训练。

再写上孩子们的体重、身高，就连最小的京京，也蹿到一米六了。

一封信几乎写了一夜。

之后，又没了消息。

1971年春节后，林彬接到署名“王长树（老杨）”的电报：我不慎在1月31日将右腿骨摔断，已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战士小姚同志照顾我。伤处发炎，持续高烧，医院已经决定给我开刀……你可否尽快向组织请假来医院……你若能来，照这个名字可以找到我。若你处组织不能给你假，也打一个电报给我……

林彬慌慌忙忙找了干校的军代表，总算请准了假，但无论如何不放北走，林彬只好带着女儿上了路。在北京中转换车耽误了一夜，路上两天两夜，林彬没有合眼。到了石家庄和平医院，林彬才知道，杨勇不同意就地手术，让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请求回北京治疗。但医院坚持马上手术。

事情紧急，林彬连夜到北京，想方设法把信送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马上打电话给总参，立即派专机把高烧不止的杨勇接到北京治疗。

半夜，西郊机场起飞了一架专机。

机长是女飞行员汪云，她只知道执行紧急任务，连块擦脸的毛巾也来不及带，就上了飞机。起飞后告诉她到石家庄落地，她在想，接谁呢？偷偷往后舱一看，笑了，原来是很久没有消息的杨勇将军，老熟人了。

杨勇住进三〇一医院，医院决定第二天就手术，医护人员忙着做完了术前检查。进手术室时，杨勇安慰林彬说，一会儿就完了，不会出什么事……

手术很顺利。

术后第二天，杨勇就要来一副木拐，缠上绷带，说医生讲拆了线才好练习走路，我可不能等那么久，这东西我会用。

◇ 杨得志说，到我这里来吧

王猛从三十八军调到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刚到北京，听说杨勇在三〇一医院，就赶来看他。在王猛印象中，杨勇的体质明显不行了，面色憔悴，只有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声音也依然宏亮。

王猛看他拄着拐，伤腿不敢用劲，行动很不方便，就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调个公务人员来照顾你。

杨勇不要，说我放出来养伤，并没解放。

王猛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想连累别人。

以后，王猛又去三〇一医院看了杨勇几次。偷偷塞在衣袋里几份中央文件带给他。如果让人发现了，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杨勇会意，赶快放进抽屉里。神不知鬼不晓，隔两天，王猛再取回来。

王猛详细给他讲了陈伯达犯的错误，批林整风中揭出了哪些问题。

杨勇听完，说问题远没有解决。

王猛当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不好问。但看来杨勇想得很远很多，他知道抓他远不是北京军区所决定的，也不是陈伯达所能决定的。

到了4月底，杨勇的腿在三〇一医院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了，不少人也劝他早一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

可在那种特殊的时候，他到哪里去呢？

应该说，杨勇摔断腿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不摔腿，还只能在裴堡农场继续关押。因为治腿，在夫人林彬的努力下，事情发生了转机，周总理批准回北京治疗，并且与北京军区脱离关系，由总政直接管理。

但是，还没有人表态你没有问题。

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表态你没有问题。

所以，杨勇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自由。

杨勇办了出院手续，暂时住在西直门171号总政招待所。

杨勇用毛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还给中央写了几封信要求工作。

林彬在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帮他琢磨，每一封信都要写很长时间。

杨勇的字很大，他知道毛泽东眼睛不好，看不了小字。

出院的前三天，警卫员孙启增请假从邯郸赶来看他。这是他在杨勇京西宾馆被抓后第一次见面。

很少能见到杨勇如此激动，他流着泪说，小孙，你受苦了。

小孙也流着泪，首长你，你也老了，瘦了。

孙启增问，出院以后准备去哪？

林彬说，还没有地方。

“九一三”之前，曾思玉就曾邀请杨勇去武汉。

孙启增说，一是到沈阳，沈阳陈锡联在那儿；二是到济南，杨得志在那儿。反正别在北京休息。

杨勇连连点头。

到底去哪里好呢？

正在济南军区任司令员的杨得志来看望杨勇。

老杨哥干脆地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来我这儿吧。

于是，5月中旬，在杨得志这位老杨哥的盛情邀请下，杨勇架着双拐，由夫人林彬和女儿京京陪同，来到青岛海边。

小孙表示要跟着去，杨勇说，你也成了家，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去了。我再弄起来，你还要吃苦头。

小孙在京西宾馆没救下杨勇，反而被弄成“三反分子”的爪牙，几经迫害，连新婚的妻子也不能逃脱，这使小孙一度精神受了刺激。

杨勇不愿意再牵连小孙了。

可以说，青岛是杨勇一生中最悠闲的一年。

杨勇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八九年，仅去过有数的几次北戴河，他不愿意去，越忙越累他越是心满意足。他不愿意闲着，每天无所事事，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在北戴河电报电话老追着，他还是不习惯，匆匆住几天就走。

可是，现在，自由相对来说有了，却没有职务，没有工作，只能闲着。

杨勇把孙毅寄赠他的曹操的诗《龟虽寿》压在玻璃板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却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苦苦思索。

在准备出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杨勇的思索越来越深，这使他在以后对江青一伙的直接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精神。

中央在北京开会，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毛主席提名增补杨勇等三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1972年7月中旬，杨勇接到任命，去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

□ 摘自 舒云《百战将星杨勇》，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于1999年9月，后于2001年3月、2004年2月、2006年、2007年多次再版

~~~~~

【回首文革】

“文革”中，我在西德当大使

• 王 殊 •

◇ 使馆的生活很清苦

我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只是我在国外当过十五六年驻外记者，对国外的情况比较熟悉，而对使馆的领导和管理却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国在西德建使馆后国内各部门很重视，很快派了人来，使馆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我担心的是，使馆的办公和生活条件随着人员的增加会越来越紧张起来。波恩是个小城市，只有三十多万人。我们建馆时，要租大一些的房子非常困难，在市内和郊区都找不到，最后只能在波恩西南两公里多一个叫尼德巴赫的村子里租了一个刚建好的小旅馆住下来，房间很小，没有想到竟住了十多年之久。当时，使馆所有的人都是过集体生活的，只有大使有一小套房间，其他的同志除了夫妇外，都是两个人一间，厕所洗澡间共用，工勤人员还有三个人一间的。过了一段时间后，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向我外交部提出。双方在各自首都交换一块地皮修建使馆办公楼房。我国外交部也有这个想法，很快经过驻华使馆同德国外交部达成原则协议。可是两国体制不一样，办起来还真不容易。对我们来说并不很难，只要向北京市政府提出申请，市政府一向很支持，很快就可以找到几块地皮让德方选择。而德方外交部却要出钱来买，市区的地皮价格很贵，而且这笔钱要经过联邦议会的批准，手续繁多。所以，等交换了地皮，再设计施工，要好多年的时间。这件事应很快办起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只能在使馆后面租了一处房子，把商务处的二十个人搬了出去，而且自己开伙。不久，又在新华分社的小楼边上再租了一栋小楼，分出一部分人去。我说，交换地皮的事在我任期内签字已经是很好的了，设计施工肯定是我的接班人的事了，我的目标是，逐步实现一个人一个房间。后来，我只是谈好了地皮，没等到签字就卸任了，但一个人一个房间还算是实现了。

另一件事是尽量改善同志们的生活。在国外人手很少，工作很多，所有的人不仅要做好全馆的清洁卫生，招待会宴会要帮厨和洗盆洗碗，夜晚还要轮换值班等。外交人员生活很清苦，“文革”以后取消了国外工资，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尾子不发钱，只发水果、冰激凌、饼干之类。假日外出游览时吃饭和门票都是不能报销的，要自带食物找僻静的地方在车子里吃。波恩有的超市给5%的回扣，成了我们买参观门票的“小金库”。馆里免费供应从洗衣粉到卫生纸等日用品，洗外衣和理发按国内价格报销，说起来很惭愧，上厕所的小费是可以报销的。那时候电视除了新闻和评论节目其他的都不准看，报刊消息和图片也不许扩散，去剧院和音乐厅就根本谈不上了。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津贴。我担任大使后每月津贴150元人民币，由于西德马克增值，我拿的马克比当记者时还少一些，其他的同志就可想而知了，一位一等秘书积一年的津贴在使馆第一个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有的德国友好人士问我月工资多少，我说一百马克，他们哈哈大笑，说我在开玩笑。现在看来，我对内部管理的工作做得很差，同志们生活很单调枯燥，虽然后来也有所改善，但这方面工作确实不够。

建国以后，在国外的外交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虽然接近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的水平，但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较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内提出适当减少国外工资。后来，国外工资不断受到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反右派运动后，降低了60%，几个月后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10%。国外工资最后实际上只有国内工资的三倍左右，在国外吃饭穿衣比国内开支大，家属的费用也要多一些，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高工资。到“文革”时，国外工资更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大罪证，非要打倒不可。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是“文革”极“左”思想的产物，很不利于发挥同志们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开展国外的的工作影响很大，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同志，都能体谅大局，注意照顾影响，不管有多少意见和困难都能克服，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

◇ 交涉记录片《中国》的播映

我接到了部内的紧急通知，指出意大利记者拍摄的影片《中国》，是一部污蔑和丑化中国人民的反动影片，如果当地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使馆要由大使出面进行严正交涉。过去，特别是在“文革”开始以后，也有过交涉反华影片的事，但都是由文化处的同志同有关单位进行交涉，结果都是不了了之，这次规定要由大使出面，看来非同一般。据我们了解，当时，西德电视台还没有播出这部影片，也不知是什么内容引起我们这样大的愤慨。西德有两个全国性大电视台，每个州都有地方台，还有一些小电视台，电影院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我要文化处的同志把其他工作先放一放，全力注意几个大的电视台和大城市的电影院有没有放映这部电影。不久，有些西方国家的电视台播出了这部影片，我国大使同电视台进行了交涉。在我国的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了很多严厉批判的文章。又有消息传来，江青看过这部影片后非常气愤，矛头对准了外交部，大骂驻外使馆“卖国主义”，事先不注意防范，事后交涉也很不力。部内的新闻司长彭华同志和我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后来还被调动了工作。我也紧张了起来，担心可能有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过而我们没及时发现，那样就要大挨批评了。

没过几天，文化处的同志看到了电视一台转播了在汉堡的北德电视台放映的这部影片。电视一台是各个州电视台的联合台，除了自己制作很多节目外，也转播州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由于这是州电视台的节目，德国人看这部影片的不会很多，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和文化处的同志也都看了这部影片，感到有不少我国内地的落后镜头，但都是真实的，而且不少西方记者在我国拍的影片中也有这样的落后镜头，不知为什么这次要这样大动干戈。当然，这些话当时都是不敢讲的。我们也不敢怠慢，一面立刻报告部里。一面马上约见电视一台台长进行交涉。本来，我们同电视一台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的大牌记者鲁格是我在当记者时的老朋友，他随同施罗德、施特劳斯和谢尔三次访华，制作了好几部记录片，观众的反应很好。当然，也听说一台的领导感到影片把中国说得太好了一些，要求鲁格做一些修改，鲁格没有同意，后来也照样放了。我原来同一台的台长很熟，在拜会他时对他们转播这部影片提出了意见，他向我解释西方的电视台同中国的电视台不同，他无法干预电视台的节目，实际上是拒绝了我的交涉。当然，我在这个情况下也很难让步，结果我一言他一句，最后弄得很不愉快。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有时在一些场合碰到了也都赶快设法避开，再也没有说过话。这样的事其实已有不少先例，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电视台是不愿意别人干预他们的节目的，即使是大使出面，也不会起多少作用，而且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交涉的结果不但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正好相反，电视一台在黄金时间把这部影片对全国放了一遍，北德电视台和不少州电视台都先后放映了一两遍，而且在放映前还说明中国使馆对此进行了交涉，德国人差不多都看到了，影片的影响反而扩大了，后来听说，在其他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交涉的结果也差不多。本来，这是一部较长的记录片，电影院一般是不放映的，因为我们进行了交涉，电影院还以此作宣传放映。后来，有好几次电视台、电影院放映反华影片时，还给使馆打来电话，要求使馆对这些片子发表评论，希望我们提出抗议，实际上是想以此作为广告招引观众。我过去当记者时，这些事我都不必管，现在真的感到大使不太好当了。

◇ 把“革命文艺”打进欧洲的闹剧

1976年10月14日，我一早从波恩乘汽车赶到南部城市斯图加特去，迎接将在中午从奥地利萨尔茨堡到这里来演出的中国艺术团。他们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各演出了一场后，要到西德的四个城市来演出。事情也正凑巧，我到了斯图加特的我们艺术团将要下榻的宾馆后，惊奇地看到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外国记者从北京发出的“四人帮”可能已被抓起来的消息。国内还没有正式的消息通知我，我就与同志们商量，决定暂不告诉艺术团的同志们，以免影响他们的演出。

这几个月来，使馆同志们一直在忙着艺术团到这里来演出的事。年初，受“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急电通知使馆，为了把“革命文艺”打进欧洲国家，要我们设法通过剧院经纪人安排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其他的革命折子戏到西德来演出。部内也来电报提醒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重要任务完成好，不能马虎。我也知道，这件事情重大，万一发生差错，使馆特别是我责任难逃。我们出动了很多人马，放下其他不是很急的工作，用全部精力来把这件事情办好。起初，我们找了好几个经纪人，他们都有兴趣，但一看剧情介绍后，都打了退堂鼓。最后，我们终于以很优厚的条件找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经纪人，好不容易取得了德方有关部门同意在四个城市演出，但德方提出，在演出的城市中要包括西柏林在内，当时，西柏林在政治上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们请示文化部最终得到了同意。在确定以后，事情就更多了。舞台要多大，幕要几道，音响灯光设备和乐池有什么要求，观众大厅要注意什么，直到吃饭要吃中国饭，房间要绝对安静，甚至是每天要多少巧克力，多少水果等等。好在西德是发达国家，这些要求都不难落实。奇怪的是，文化部还通知我们，在这个一百多人的艺术团中，除了正式演员之外，还有一些是“落实政策”的替补演员，要我们注意保卫安全工作。还有些事更让我们摸不清头脑，说艺术团带去的灯光设备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对外要注意保密，不能让德国人把我们的技术学去了。后来，艺术团的先遣人员到德国来装台时，德方的技术人员看到了我们这些又多又大又笨重的灯光设备，直摇头说，这些设备太落后、太笨重了，现在的设备已轻便、灵巧得多了，而且全部用计算机控制了，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想窃取我们这些在国内报纸上大吹大擂的“机密”。

我国驻西欧的好多使馆为这个艺术团前来演出作了很大的努力，大都落了空，最后只落实了在奥地利、联邦德国两个国家的演出。文化部通知说，决定先到这两个国家演出，以后再设法第二次到欧洲来。根据日程安排，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各演出一场，然后乘大巴到西德的斯图加特、埃森、汉堡和西柏林四个城市各演出两场。艺术团在中午到达后，我在会客厅里同团长和三个副团长见了面，这四个人中只有业务副团长我在舞台上见过，他演指导员洪长青的小伙计，已是文化部的什么局长了。我要文化参赞向他们汇报了演出安排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说等看了舞台后再说。团长向我们大谈特谈他们在离开北京时张春桥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全体人员，要他们作为“文装解放军”把“革命思想”传播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之类的大话。艺术团要在第二天演出，更苦了我们使馆的同志们，演出前售出的票很少，要动员更多的华人华侨去看，又由使馆出钱买了不少的票送给德国朋友来看。州长是很熟悉的，而且也准备邀请他访华，原来说好要来看的，后来一听剧情就托词不来了。几天后，艺术团到埃森演出，使馆收到了国内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正式通知。我立即赶到那里去，向艺术团的领导作了传达，但是为了不影演出，并且防止发生混乱和意外事件，我同他们商定暂时不向下传达。团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虽然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但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将信将疑，也有的看来还有抵触情绪。我感到担心，不得不警告他们，如果团内发生什么问题，团领导要负全部责任。可是，团员们到汉堡演出时已出现少数几个熟悉的人中窃窃私语的情况，当然也不敢公开议论，特别是一些被称为“落实政策”的二等团员更是一句也不敢说。他们虽然看不懂德文报刊，但看到连日登载了“四人帮”的照片，已感到国内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到西柏林演出时，他们已从华人华侨那里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全部情况，一些人高兴，一些人沉默和担心，也有一些人害怕。在宾馆的饭厅里吃饭时，有人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有的演员之间发生了大声争吵，甚至要动起手来。我要使馆陪同的同志立即向他们传达了国内的通知，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要他们照顾在国外演出的大局，把最后一场演好，绝不许在国外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彼此之间有什么意见等回国后再说。这时，国内报纸已正式公布了有关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公报。演员们都是听话的，在西柏林演好了最后的一场。从他们来到后，我们使馆的同志特别是陪同的同志度过了许多的不眠之夜，一直担心团内发生意外的事件。艺术团在西柏林演出结束后，全部人员乘飞机到了波恩，立即换乘国内派来的两架专机经罗马尼亚回国。我又在机场上向他们作了交代，后来听说他们在飞机上虽然不断有小的争吵，不过始终没有动手，可是一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扭打起来了。

我们使馆的同志们刚刚庆幸这件事总算平安度过，艺术团全体安全回到了国内，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件。可是不久国内的同志写信告诉我说：艺术团个别领导人到德国后早已写信报告了江青，控告我和使馆其他同志不到边境去迎接他们；事先做宣传动员工作不力，售出的门票很少；安排食宿不好，在汉堡的饭店靠近红灯区；宾馆不安静等等。这些小报告都是作为私人信件由信使带回国内后经过普通邮政寄出的，而且信封上写的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都是按江青办公室的人员事先约定的化名和地址，实际上都是寄给江青的，我和使馆同志不禁大大地吁了一口气，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我们都是罪责难逃。后来，又听说，“四人帮”已在上海挑选了一批“工人大使”，准备来接替我们的工作。

□ 《中外书摘》 2007年第9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